

近代法国传教士对我国北方的科学考察 与天津北疆博物院

于树香

(中共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 天津 300042)

[摘要] 本文利用了重要的、鲜为人知的西方及日本有关文献, 参照中国文献, 考证了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对我国北方的科学考察活动和在天津租界创办北疆博物院的史实, 指出北疆博物院在中国文博考古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

[关键词] 近代, 科学考察, 北疆博物院, 国内外影响

The Modern French Missionary's Scientific Explor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ianjin Beijiang Museum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important and little-known western and Japanese materials, comparing with Chinese docu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ary's explor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jin Beijiang Museum. as well as the museum's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eum and archaeology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Key Words: Modern, Scientific exploration, Beijiang Museum, Influence in home and abroad

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后, 西方宗教相伴而至。随之而来的西方传教士, 除了一部分充当殖民者的侵华帮凶外, 也有相当的人在中国进行了诸如教育、医疗、科学考察等公益活动。天津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区, 法国传教士为了对我国北方进行深入的科学考察, 于1912年在天津开始筹办北疆博物院, 并1922年正式建成。它作为天津工商学院的附设教学与研究机构(法文名意为“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 Mesee Haong ho Pai ho de Tientsin, 英文名为: The Haongho-Paiho Museum in Tientsin^{[1]p. 255}), 隶属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教区管辖。此后, 北疆博物院以研究史学为名, 在我国西北各地采集很多古代化石, 并藏有大批有关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矿物学以及华北特有的工业方面文献, 成为一个专门对我国北方广大疆域内地理、自然进行勘测、考察的科研机构。

1912年, 36岁的法国神父桑志华

(E. Licent. 黎桑, 号志华, 1876年生)^{[2]p. 285}, 获得法国科学院动物学博士学位, 他提出要来华搜集中国北部黄河等流域自然地理史和博物资料的设想, 得到了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教区修道院长金神父(Raphael Gaudissart)、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北方省负责人普利埃尔(L. Poullier)、法国耶稣会总会长沃尔恩兹(Franz Xaver Wernz)的大力支持。

桑志华到天津来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自明代以来到鸦片战争前, 一些教派团体进入中国, 以传播宗教为主, 同时也连带传入了西方的文化和科技知识。1868年, 精通动物学和植物学、32岁的法国耶稣会士韩伯禄(Pierre Heude. 1836—1902年)来华, 他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长期旅行采集动植物标本, 创建了上海徐家汇自然历史博物馆, 并任馆长, 还发表了论著。韩伯禄去世后的翌年——1903年, 精通鸟类学的43岁的法国耶稣会士柏永年(Frederic Cour-

tois. 1860—1929年)来华,继任徐家汇自然博物馆第二任馆长^[3]。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馆取得了在这一领域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地域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尚属空白。桑志华打算填补这一空白,他在北方选址,认为天津最合适。

1914年春,桑志华从欧洲经西伯利亚铁路来华,3月25日抵达天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要求桑志华的隶属关系在献县教区,由献县教区和法国北方耶稣会教省为桑志华提供创办和旅行考察经费及以后的常经费。献县教区还指定天津崇得堂为桑志华使用。崇得堂1870年建成,在法租界路易路(现天津营口道总工会后),有13间宽敞的房屋。这里与所属各地的教堂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为桑志华在中国的考察提供方便条件。桑志华到达天津后立即前往献县教区,用一个月的时间,从调查了解献县附近的水文、地质、气候等入手,开始熟悉中国情况,为以后的旅行和考察做准备。

从1914年7月13日开始,桑志华便开始了对我国北方长达二十余年的考察、采集和发掘活动。1914年,他考察了大同和太原等地。翌年考察了晋南和山海关。这一年,法国外交部提供了5000法郎经费。1916年考察了晋南、陕中、汾河、秦岭、华山和太白山。1917年考察了晋冀交界处、北京西山、河北涿鹿和蔚县间海拔3200米的小五台山、内蒙古北部戈壁地区和张家口。桑志华经过4年的勘察,对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他深入中国腹地奠定了基础。

从1918春天,他开始对中国腹地进行考察。他沿着山野间荒僻的小路,横穿山西中部,经过陕西北部、鄂尔多斯南部、甘肃北部到达兰州,又从武威直到祁连山,再向西伸至青海的西宁,在绕行了青海湖一周之后,又沿着夏河进入甘肃西南部、东北部,而后经过内蒙的鄂尔多斯北部,穿过大青山,抵达呼和浩特。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大量的采集活动,使他不能及时返回天津,1918年冬天只好留在甘肃乌鞘

岭过冬。在这次为期两年的艰难旅行考察中,桑志华只回天津一次,他风餐露宿,艰难跋涉,但收获很大。为运载采集品,他曾雇用了7辆5套牲口的大车和18匹骡子。采集的植物标本累积起来可达10米高,还有一系列哺乳动物皮张、形态各异的昆虫标本以及矿物标本2000件以上。此外,更重要的是1919年6月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化石地点。这是他发现的第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也使得他的发掘有了明确线索。1920年,桑志华又赴山西中部、陕西、鄂尔多斯和甘肃庆阳一带进行考察挖掘,采到了完整的标准晚第三纪动物区系化石,而且还找到了三件旧石器时代打制的石器,装载这批标本就用了83头骆驼。

经过几年的考察、发掘、采集,桑志华收集的各种标本,多得使崇德堂已无法容纳。北疆博物院建院工作提到法国教会、献县教区,以及法租界当局的议事日程。于是由献县教区修道院长卜神父(Jean Debeauvais. 让·德布威,法国籍耶稣会士)拨给一块紧临英租界马场道南侧一段空地(现天津马场道117号),并由教会向各方募集资金与工商学院同时兴建。1922年先建主楼即北面的办公楼,1923年主楼建成后,北疆博物院才正式打出了自己的旗号。1925年在主楼的西端续建了一座3层的陈列室。1928年对外开放。1929年,在与主楼平行的位置上,兴建了一座两层的南楼,专门做为藏品库,1930年建成。该博物院以研究自然史学为名,曾在我国西北各地采集很多古代化石,并藏有大批有关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矿物学以及华北特有的工业等方面的文献。该院附设实验室与情报部,主要供该校教学使用,并为欧洲博物馆及自然历史研究机关提供研究标本。

1914至1924年,天主教传教士们送来了大批有关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矿物学以及华北特有的工业等方面的文献。当时,北疆博物院还计划建一公开的博物馆,永久展览上述藏品,伴随讲演,出版一系列著作,同时还酝酿建设一植物园,并希望其

他外国租界也对上述设施提供支持。但除以桑志华为主出版了一系列著作^[11](p. 255~256)外,其他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1920年,天主教遣使会派了一名教士亨利·塞尔(Henri Serre)协助桑志华专门采集和整理植物标本,自此桑志华有了第一个正式属员,这个人就是神甫柴联抱(Jean-Henri Serre)^[41](p. 171)。1921年,桑志华考察了芝果和威海卫。1922年考察了鄂尔多斯南部的萨拉乌苏河(蒙古名,又作萨拉乌素高勒,为黄河中游支流,从东向西经陕西横山县从滴哨沟湾流入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大青山和西夏古迹。在滴哨沟湾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套人”顶骨化石和股骨化石,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轰动。因为人类的发祥地是否在中亚,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于是巴黎博物院1923年派出法国知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与桑志华联合组成“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Mission Paleontologique)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5](p. 118~131)。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6](p. 27),又名德亚)应桑志华邀请,1923年4月随桑志华赴鄂尔多斯和宁夏一带考察,翌年又随桑志华赴内蒙古哈达(乌兰哈达,今赤峰)、林西、达赉诺尔(克什克腾旗西部)、戈壁、喇嘛庙,经张家口返回。在考察期间二人做了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合作发表了不少文章。桑志华与德日进在山西、陕西各地多有发现,尤以在绥远桑干河所发现之泥河湾堆积更为丰富。他们所采集的标本,除一部分放在北疆博物院外,大部分运往巴黎自然博物院。德日进还被北京大学翁文灏先生聘为名誉顾问。为加强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德日进经常往返于天津、北京之间,出入于葛利普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的美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寓所,成为北平学术界名人之一^[7](pp. 42-43, 64-65)。德日进曾在1928年至1929年度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上,当选为唯一的外籍评议员^[8](p. 230)。他于1930年在中蒙边境的通古斯盆地一带考察,1946年3月离华返法,1955年4月10日病逝于纽约,享年74岁。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中国学者杨钟健(1897年6月1日生,陕西华县人)1927年到德国,经英国伦敦到达法国,慕名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在此,首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德日进,他非常兴奋,做了这样描述:德日进“为法国天主教神父,亦为德国古生物学家布尔(Pierre Marcellin Boule. 1861—1942年)之高足,因为发表文章触犯教规,被遣送到中国。他在中国与桑志华神父合作研究自然科学数年,曾到华北不少地方,对古生物地质极有造诣,且涉猎范围甚广,旁及人类学、岩石学、考古学等。他最近由中国返国,我们相见甚欢。他说在中国见到我的(研究啮齿类化石博士)毕业论文原稿,甚为钦佩。他在巴黎带领我会见了许多法国地质学家与古生物学家,并参观了博物馆。桑志华与他在中国所采之化石,一小部分存于天津北疆博物院,一大部分则运到法国陈列,尤以在桑干河泥河湾听(‘所’之讹)采之上上新统化石最为丰富。他这次回来,正为督促修理这些化石,并作研究。故我在此数日,得益实为不少。”

宁夏古遗址中最著名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水洞沟文化遗址,1988年初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1920年,在内蒙古三盛公(今磴口县政府所在地南的粮台)传教的39岁的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神父石杨修(Gaspar Schotte. 一译作“肯特”)由宁夏赴陕西途中,在横山堡水洞沟东约5公里处发现一具披毛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些远古石器,其中有一件采自黄土峭壁的石英岩石器。这是在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9](pp. 1, 220)。石杨修是中国天主教最高负责人首席助理,1931年12月14日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宁夏代牧区(Vicariat Apostolique de Ningsia)宗座代牧主教。石氏把1920年发现的水洞沟文化遗址情况告知桑志华。近年我国编写的一部宁夏方志书记载:“一九二三年四月,桑志华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李盛特等到水洞沟进行实地考察。”^[10](p. 23)实际上,桑志华即李盛特,一为华名,一为译音。

此次考察发掘了五处遗址,仅其中一处就

出土了三百多公斤石器, 后又将全部石器送交 46 岁的法国考古学家布日耶 (Henri Breuil) 鉴定。布氏曾任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教授, 后任法国科学院教授。他对水洞沟的石器提出了文化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稍晚的看法, 1928 年在巴黎与桑志华及德日进等合作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旧石器的论文。

1960 年, 中苏两国古生物工作者又在水洞沟联合进行了一次发掘, 出土石器约两千件, 后经分析研究认为这个遗址的文化时代, 定为约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较为合适。1963 年, 在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布日耶的高足裴文中教授临场指导下, 对水洞沟文化遗址又作了一次系统发掘, 从旧石器时代地层中, 除发掘出野驴、犀牛、鬣狗、羚羊和鸵鸟等动物化石外, 还发现了人类用来缝缀兽皮衣物的骨锥和显然是装饰品的穿孔鸵鸟蛋皮。这些考古发现, 不仅为人们描绘出了一幅水洞沟人的原始生活图景, 而且说明 3 万年前水洞沟气候温湿, 水草丰美, 树木参天, 鸟兽成群, 自然景观十分壮丽。

桑志华对中国北方文化遗址的开创性发现, 大多或者几乎是全部引来了后人的继续发掘研究。一个传教士背景的古生物和古人类科学工作者, 在兵荒马乱的异国他乡, 用短短 25 年的时间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 并建立一个名垂后世的藏品丰富的博物馆, 其功不可没。为了表彰桑志华的“特殊”功绩, 1927 年 4 月, 由法国教育部、外交部和法国科学院提名, 法兰西共和国奖给他一枚“铁十字骑士勋章”。

1930 年, 桑志华到日本游览考察^[11]。1928 年, 献县教区派来了华籍耶稣会修士王永凯 (Jean-Baptiste Wang) 专门负责北疆博物院藏品物质和设备保管等事务性工作, 算是工商大学的职员。1935 年, 献县教区又派法籍耶稣会修士韩笃祐 (Nicolas Haser) 接替王永凯。

1934 年, 法籍耶稣会神父汤道平 (Maurice Trassaert) 从工商学院教授职调入北疆博物院。1934 年他陪同桑志华考察了山西黎城县海拔 2200 米的太行山、潞安府、泽州和河南北

部。1935 年又陪同桑志华考察了山西海拔 2255 米的霍山及霍山南至黄河中间的一座海拔 2178 米的山。1940 年离华。

由于“七七”事变爆发, 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我国的东北、华北, 以至华东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军占领, 桑志华等无法在中国北方继续考察, 停止一切工作, 于 1939 年 (时 63 岁) 返法。此前, 桑志华劫掠走许多古代化石, 转送到巴黎历史博物馆^[12]。1939 年 5 月, 日军对英、法租界封锁时, 北疆博物院仅留下了几位工友和一名神父看守, 另一些研究人员转移到北平使馆区东交民巷, 包括接替院长职务的罗学宾 (Pierre Leroy)。1939 年 8 月, 天津发生大水灾, 北疆博物院被淹, 水深超过一米^[13]。1940 年 6 月, 北疆博物院利用日军对英、法租界解除封锁的短暂时机, 以建立一个“私立北京地质生物研究所”为名, 把最重要的标本、实验室设备和部分图书资料, 转移到北平使馆区东交民巷台基厂三条三号。天津的北疆博物院则交给刚来的任职于崇德堂图书馆及工商学院的法籍耶稣会士盖斯杰 (Albert Ghesquieres) 留守。后来院长由校长刘乃仁兼任。北疆博物院一直延续到 1947 年才停止工作^{[14] (p. 37)}, 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天津自然博物馆^{[15] (p. 348)}。

新中国成立后, 据接收北疆博物院的有关同志回忆, 北疆博物院的藏品是相当庞杂的, 除了自然标本外, 还有文物和民俗学的收藏, 但绝大多数藏品属于自然标本。有以昆虫标本为主的 11 万件 (号) 动物标本; 有以高等植物为主的几万件植物标本; 有化石和石器标本, 绝大部分是新生哺乳动物化石; 还有矿石标本等等。有关北疆博物院向国外送标本情况也有一些资料记载: 1922 年, 有 4100 种植物标本送到巴黎博物馆; 同年又将数目极为可观的菌类标本送往巴黎博物院。1924 年又将 100 箱化石标本运往巴黎博物馆。

北疆博物院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和影响。解放前, 曾被中国地学会研究所主任和中国古生物创始人丁文江所赞许, 被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称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博

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邱占祥曾撰文道：“北疆博物院是桑志华花了近 1/4 个世纪的时间，呕心沥血，从无到有，一人操办起来的。据桑志华本人的估计，1935 年北疆博物院的动产和不动产的总值大约一百万美元。就哺乳动物化石而言，有四个地点是他发现的：1. 甘肃庆阳（三趾马动物群）；2. 内蒙古萨拉乌苏（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和石器）；3. 河北泥河湾（相当于欧洲维拉方期动物群）；4. 山西榆社（上新世哺乳动物群）。这些化石绝大部分都保留在中国，主要存放在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一小部分存于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只有一小部分流散到国外，包括现在巴黎自然博物馆的一个萨拉乌苏的披毛犀的骨架。”

天津北疆博物院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博物馆，在院长桑志华的主持下，自 1914 年开始，历经 25 年，从黄河、白河流域开始，远至青海、西藏边境，在当时交通工具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们长途跋涉二万余里，搜集古生物、地质、矿物、人种学、动植物及土产品等，收集植物标本三万五千余种、人类生物标本七千余种、动物标本二千余种、矿物标本千余种，使该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它不仅为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和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而且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博考古都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北疆博物院作为外国在近代天津的文化机构，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色彩，特别是桑志华等凭借着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权，劫掠走许多古代化石等，转送到巴黎历史博物馆，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收稿日期】2002 年 4 月 9 日

【作者简介】于树香，1953 年生人，女，天津市人，中共天津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参考文献：

- [1] (澳大利亚) 雷穆森著：《天津—插图本史纲》，英文版，1924 年。
- [2]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 [3] 《「学术」二关スル调查报告书（一）」》，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秘，1941 年 8 月。
- [4] 北平比利时籍遣使会士方立中 (Pierre - Joseph Van den Brandt.) 编著：《中国遣使会士们》(Les Lazaristes en Chine) 北平，1936 年。
- [5] 刘东生、卢滨涛：《德日进对中西科学交流的贡献》。王鸿祯主编：《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2 年。
- [6] 北京天主教北堂遣使会包士 (石) 杰神父 (Jean - Marie - Vincent Planchet) 编：法文《中日传教》(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an) 北京，1933 年。《中日传教》是天主教传教年鉴。
- [7] 《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 年。
- [8] 夏湘蓉、王根元编著：《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1982 年。
- [9] 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 年。
- [10] 《当代中国的宁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 [11] 桑志华编：《1914 - 1935 年二十二年来对中国北部、即满洲、蒙古和西藏低处的考察》(Vingt deux années d'exploration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Mandchourie, en Mongolie et au Bas - Tibet) [1914—1935]。天津北疆博物院，1935 年，8 开本，正文第 41 页，内插 40 幅照片，还有北疆博物院平面分布图及探险路线地图各一张。
- [12] 关于天主教在津的教育事业，可参见日本人的调查报告，即：《华北ニ於ケル基督教调查（其ノ四）天主教》（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调查资料第 107 号，昭和 16 年 4 月 24 日，铅印本，文化第 2 号，秘，346 页，该所属广濑明及另三人担当）中对工商大学和北疆博物院的记载。
- [13] 见《天津に於ける諸外国人の対支文化状況调查》（载兴亚院政务部编《调查月报》1940 年 10 月 1 卷 10 号）对工商大学和北疆博物院的记载。
- [14] 文化部文物局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 年。
- [15] 罗澍伟主编：《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作者: [于树香](#)
作者单位: [中共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 天津, 300042](#)
刊名: [历史教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ISTORY TEACHING](#)
年, 卷(期): 2002, "" (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2条)

1. 雷穆森 [天津-插图本史纲](#) 192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录](#) 1981
3. [学术]二关スル 调查报告书(一) 1941
4. 北平比利时籍遣使会士方立中 [〈中国遣使会士们〉\(Les Lazaristes en Chine\)北平](#) 1936
5. 刘东生, 卢演传 [德日进对中西科学交流的贡献](#) 1992
6. [杨钟健回忆录](#) 1983
7. 夏湘蓉, 王根元 [中国地质学会史](#) 1982
8. 吴汝康, 吴新智, 张森水 [中国远古人类](#) 1989
9. [当代中国的宁夏](#) 1990
10. [桑志华 1914-1935年二十二年来对中国北部、即满洲、蒙古和西藏低处的考察](#) 1935
11. [文化部文物局 中国博物馆学概论](#) 1985
12. [罗澍伟 天津通志·附志·租界](#) 1996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罗桂环, LUO Guihuan 20世纪前期两次失败的中外合作科学考察及其原因](#) -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 26(3)
上世纪30年代初,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等组织的两次中外合作科学考察,因为经验不足,以及对外方的意图缺乏细致了解,因此无论准备工作还是成员的选择都存在各种问题,加上外方并无合作诚意,所以合作不成功。回顾这些学术史上的事件,对于了解近代我国学术界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有一些帮助。
2. 期刊论文 [潘桂仙 近代广西农事试验的兴办及其成效](#) -理论月刊2010, "" (9)
近代广西农事试验大体经历了清末“新政”到民国前期的艰难摸索、抗日战争时期的短暂兴盛和内战时期的停滞与缓慢发展三个不同阶段。在农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农事试验在农作物品种与品种的改良、病虫害的研究与防治、科学考察与农业布局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奠定了广西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为广西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3. 会议论文 [罗桂环, 徐凤先 20世纪一次成功的中瑞合作科学考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2005
在20世纪的前期,中国的学术界与瑞典著名地理探险家斯文·赫定之间有过一次成功的科学考察合作。有关此次合作的情况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但亲历此行的袁复礼和刘衍淮等在他们的相关文章中有出色的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那玉林和国家图书馆的林世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学通等学者也对相关的情况作了一些研究。其中包括了合作的形成过程以及许多为世人熟知和称道的成就。笔者认为对此次合作取得成功的原因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毕竟其中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东西。
4. 期刊论文 [霍文冕, 曾宪章, 田伟之, 曾文义, 尹明端 北极楚科奇海近代沉积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初探](#) -极地研究2003, 15(1)
于1999年夏季我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期间在楚科奇海采集了三个沉积物岩芯,并采用中子活化法(INAA)测定了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的含量。结果表明,其含量与东海大陆架细粒沉积物的稀土元素含量十分接近,稀土元素的含量沿沉积物岩心的垂直分布呈现出随深度轻微增大的趋势。页岩标准化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相对平缓,Ce有轻度异常,表明沉积物稀土元素除了陆源物质以外,也存在生物沉积作用的来源。稀土元素与指示陆源的元素Al具有良好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地壳丰度所计算的富集因子接近于1,进一步说明楚科奇海沉积物中的稀土元素以陆源物质输入为主,通过江河携带入海,最后随碎屑物质、悬浮物而沉积下来,并保持一种稳定的沉积状态。
5. 学位论文 [刘青瑜 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 2008
近代以来,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内蒙古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同时,他们还进行了许多其它方面的活动,如办医院、办学校、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等。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内蒙古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概述传教士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教士在内蒙古除传教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进而总结他们的这些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影响。
序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和目的、研究的概况、资料情况、研究的方法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以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为基础,重点概述了天主教传入内蒙古的情况。第二章从医疗、教育、慈善、抗战、传教士对鸦片和匪患等社会问题的处理等方面,详细考察了传教士的社会活动。进而总结出传教士的社会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本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以绥远教医院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所进行的医疗活动。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考察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办的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第三部分从救济灾荒、兴办育婴院及安老院等方面具体研究了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公益慈善活动。第四部分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对内蒙古的重要贡献。第五部分详细考察了传教士对内蒙古社会存在的鸦片和匪患问题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第三章以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考古学和蒙古学科学研究活动为重点,深入探讨了传教士的科研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

在考古学方面,主要分析考察桑志华、德日进、闵宣化、梅岭蕊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并阐述了传教士的考古成就对内蒙古考古学的影响。在蒙古学方面,文章具体研究了传教士田清波和赛瑞斯两位蒙古学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对内蒙古学术界的影响。结语部分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置于中国和内蒙古近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 and 评价。并得出结论。文章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展的各项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对内蒙古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天主教传教士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确实对内蒙古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一方面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传教士们通过这些活动也把内蒙古介绍给了世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内蒙古。可以说,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

6. 期刊论文 [刘明. Liu Ming 试述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在新疆的民族学调查 -新疆社科论坛2010, "" \(1\)](#)

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是中国边疆探索史研究的热点内容,多为学者关注,也日益成为普通读者关心的热点。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少有记述。马达汉对新疆的考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考古、人类学、气候等方面,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旅行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科学考察资料,这对我们研究新疆近代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7. 期刊论文 [金俊 迷人的科学探险踪影 -知识就是力量2004, "" \(7\)](#)

聚焦南、极探访北极、扫描西部、穿越峡谷、张继民以新闻报道把一个科学考察壮举推向世界,也以一个个亲身经历绘就自己的科学探险壮景。中国古代曾有过玄奘取经、徐霞客游记、郑和下西洋的灿烂探险历史而在近代,探险事业却因国运的积弱失却了足音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也让中国入走向世界。

8. 学位论文 [李丽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探析 2005](#)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问题,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本文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形成是在正确把握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的形成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部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主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科学考察和对农民的阶级分析,围绕着农民革命动力论,确立了农民革命主力军的地位;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充分调动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的积极性;通过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使农民战争区别于旧式农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80%多的基本国情,围绕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指明了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确立了农业的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使农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第四部分“对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失误的再认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出现失误。出现失误的原因主要有:客观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过于强调和急于实现工业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没有弄清楚。

第五部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历史启示”。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误,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对于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

9. 期刊论文 [刘化仁 沧桑罗布泊 -地理教育2002, "" \(3\)](#)

罗布泊,这颗中亚地区的明珠,历史上曾一度放射出璀璨的光辉。近代因缺水而日趋寂寞消沉。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里将要再度热闹起来。事实上近些年来,不管是寻觅文物、发掘古迹、科学考察、观光探险,还是找水找矿,人们早就把眼睛瞄向了这块神秘的土地……

10. 期刊论文 [李涛 中国近代第一篇地震科学考察报告 -云南档案2004, "" \(3\)](#)

云南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独特,地质构造复杂,一方面造就了神奇的自然景观,一方面也成为地震灾害频繁发生的省份。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抗震减灾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大量的地震档案。在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些珍贵档案中,有一份写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地震考察报告,经专家考证,是近代中国第一篇关于地震的科学考察报告,对我国地震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sjsx20020600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da5fd5b7-f3cd-4064-9360-9e4d00f11a9e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